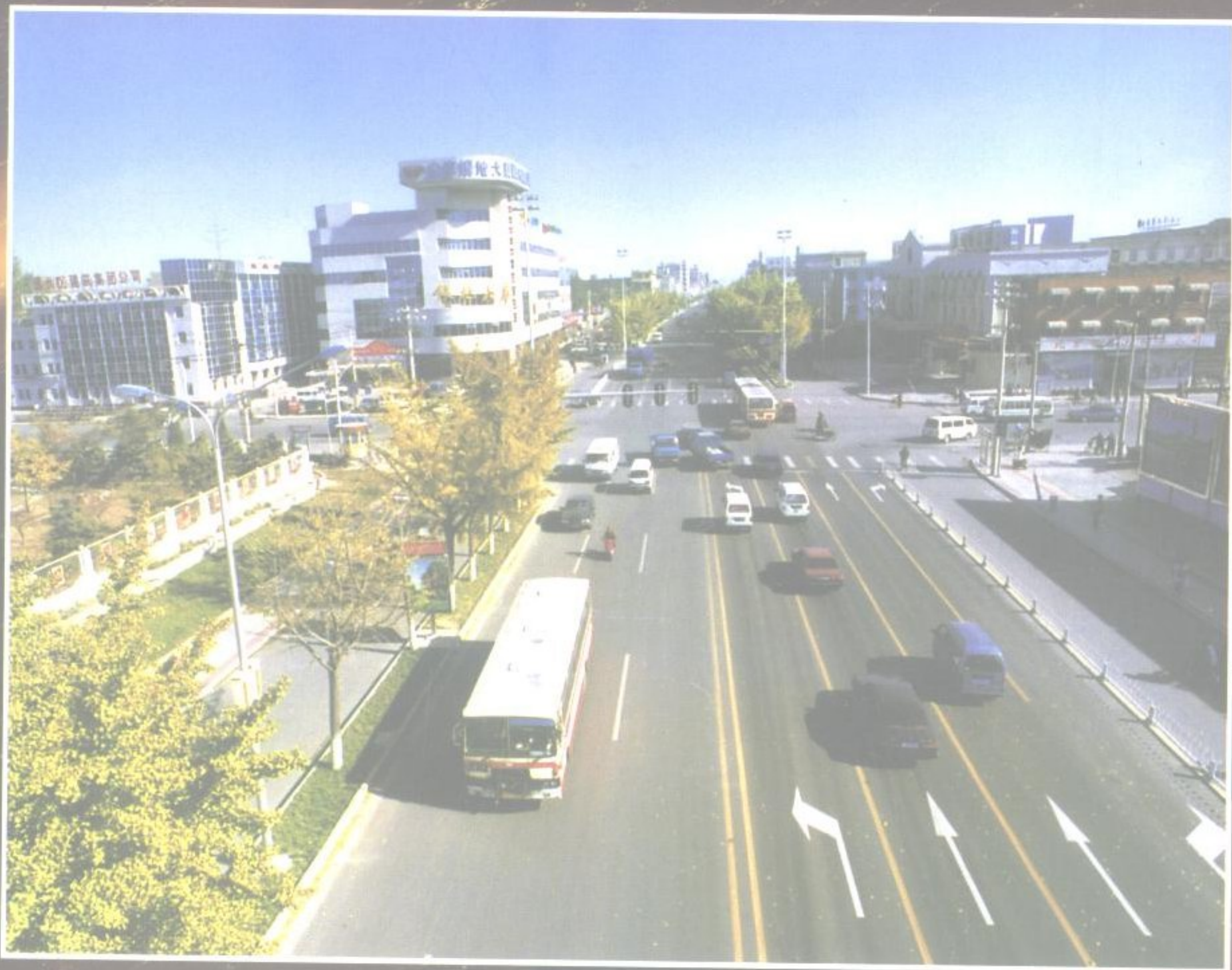


文史选刊

第 18 期

纪念通州解放五十周年专辑



纪念通州解放五十周年专辑

文 史 选 刊

第 18 期

1998 年 12 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通州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办



本期编审：

朱学民
鲁宗福
叶永清

本期编辑：

张晨声
赵 玉
王文宝

封面题字：

欧阳中石

目 录

- 通州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 王田波(2)
- 攻克马驹桥 孟宪良(6)
- 通州解放后的训俘营 曾 乃(7)
- 在接收通州的日子里 岳锡忠(8)
- 参加接管简易师范学校的经过 曹乃木(9)
- 人民政府接管潞河医院的回忆 李国纯(10)
- 店员工人争自由二三事 任大湖 张振宗(12)
- 疏浚凉水河亲历记 闫振峰(14)
- 取缔反动道会门概略 鲁新鹏 李明玺(16)
- 解放初期文化馆工作琐忆 林 为(17)
- 通州教育五十年 王文续(20)
- 艰苦奋斗办广播 黄剑秋(24)
- 通州百年电信 刘海波(26)
- 新旧通州的公路 耿宝珍(32)
- 人民代表提案引起的
 修建新华大街工程 范 昕(37)
- 我所知道的通州报纸 李 阳(39)
- 改造后的新华大街 晨声摄(封面)
- 新华大街今昔 晨声摄(封二)
- 通州第一所农村中学
 ——永乐店中学 妹平摄(封三)
- 西马庄、北杨洼村新貌 晨声摄(封底)

7096/91

通州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

王田波

151

1948年12月14日通县解放。通县公安局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了近两年的剿匪斗争，狠狠地打击了土匪活动的嚣张气焰，使通县地区的社会治安逐步好转，人民群众过上了幸福安定的新生活。

土匪猖獗 民无宁日

解放前，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对通县人民进行了残酷的统治和压迫，军警、特务、道会门、土匪、恶霸多如牛毛，把好端端的通县搞得乌烟瘴气。

通县解放后，被打倒的反动阶级不甘心失败，进行了种种破坏和捣乱。他们有的以信仰自由为名发展反动组织，到处串联、造谣言，反对土改，反对抗美援朝；有的明火执仗，暗地里打黑枪杀人放火；有的还伪装成政府干部或解放军，公开进行抢劫。他们成员复杂，大多是日伪、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自卫团、壮丁队的骨干和流氓、惯匪、兵痞、烟鬼。有的还当过县参议、联乡乡长、大队长、分队长。他们对新中国最仇恨，对人民最凶狠，手段最狡猾、最残忍。仅在1949年1月9日，地处通县三、四、五、七区与邻县交界地带及平津公路上，就制造了72起拦路抢劫和杀人案件。

1949年3月的一天下午，湖北省枣阳县的陈君业，被土匪打死在通县杨闸村东的平津公路上，钱和衣物全部被抢走。同年4月18日，在通县八区双树村西，3个化装成政府干部的土匪，以查路条为借口，抢走两名女教

师的长城币（我人民政府发行的）104万元，并将其中一名女教师强奸。同月，在通州城南门外平津公路旁麦地里，发现一具车夫的尸体，车、牲口和车上装的粮食全被土匪抢走。同年9月22日，住北平市哈德门外王老胡同16号的郭汝英（男，41岁），骑自行车从天津返京被土匪杀害在六区梨园村西平津公路上，车和上面载的布匹全部被抢走。

进入1950年，土匪活动有增无减，各种抢劫案件仍不断发生。1950年1月18日，中央密云矿业合作社的汽车从天津返京，在通县三区安平镇的京津公路上被六七名武装土匪拦截，土匪把司机和押车的五花大绑捆住，劫去黄金9两2钱，人民币6490元（旧币）。同年3月20日，通县五区堰上村农民张福瑞去北京卖粮食，被土匪打死在该村西3里地处，大车、驴、骡、粮食等均被抢走。同年5月12日凌晨1时许，五六名带盒子枪、冲锋枪的土匪，闯进七区马驹桥镇德茂楼布店，将店主李永贵、伙计2人捆绑，抢走布13匹、毛巾45条、袜子20双、自行车1辆、人民币20万元、肥皂8条、被子4床、毡子1块、怀表1块等物。

土匪活动猖獗，人民生活不得安宁，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人民群众不敢外出经商，妇女夜间不敢出门，连农民白天下地劳动也提心吊胆，人心惶惶。对此，广大人民群众反应强烈，有的说：“旧社会兵匪一家，官兵互惠，他们横行霸道，没人敢惹；新社会，咱们就该抽他们的筋，扒他们的皮，把他们全部消灭。”许多群众强烈要求政府严厉打击土匪的犯罪活动，有的主动地向政府提供土匪活

动线索，自觉要求加入打击土匪活动的行列。

严密部署 发动群众

1949年初，中共通县县委、县政府遵照上级指示，就开始注意了对土匪活动的打击。但是，由于当时工作很多，未能集中力量、集中时间进行清剿，土匪的骚乱和破坏仍不断发生，嚣张气焰未被遏止住。

1949年5月，中共通县县委、县政府遵照上级指示，成立了通县剿匪指挥机构。1949年10月，中共通县地委社会部长会议决定进一步深入开展肃匪反霸工作。中共通县县委、县政府立即行动，进行部署，加强了社会治安管理，成立了由公安干警、驻军参加的侦察巡逻队，以武装镇压和便衣隐蔽侦察相结合的形式，不分昼夜地战斗在交通要道、城镇街巷和城、乡、区、县的边沿地带。由县公安局局长卫民带领的公安队一个班，长期住在通县七区马驹桥镇，配合派出所值勤，迫使土匪活动有所收敛。针对青纱帐季节土匪活动更加猖狂的特点，通县公安局发动和组织村、乡、区治安联防，看青护粮，盘查可疑人、可疑物，发现情况立即上报，有了线索追查到底，直至破案。

1950年5月，河北省公安厅工作队和通县专署工作组，来通县领导和指导剿匪工作，进一步调整和充实剿匪指挥机构。这时中共通县县委直接领导剿匪指挥部的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由县委常委、公安局局长卫民（6月以后换杨清波）担任；县公安局副局长刘志武、省公安厅工作队长燕生、通县军分区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张治安、情报科科长万恒任委员，下设五个组，共计55人。各区、乡也相应成立了剿匪指挥机构。县剿匪指挥部及时地计划、部署了全县剿匪工作，确定通县三、四、五、七区和京津公路为剿匪的重点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派工作队深入开展工作。县公安局局长卫民带工作队继续在七区马驹

桥镇蹲点，组织指挥七区和全县的剿匪工作。他还亲自去武清县联系联防剿匪工作。副局长刘志武、四区区委书记李玉祥，都亲临剿匪斗争第一线，组织指挥并参加了追剿分队的工作。

剿匪指挥部和全体肃匪工作人员，通过学习上级指示深刻认识到，剿匪斗争必须深入宣传、发动群众，大打剿匪人民战争，才能彻底消灭土匪，夺取剿匪斗争的全面胜利。他们始终把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放在剿匪工作的首位。中共通县县委和县政府印发了有关剿匪的文件，在党内外层层发动，逐级贯彻。并且利用多种形式，宣传剿匪政策和土匪活动的危害，宣传剿匪斗争重要性和必要性。

治安联防 协同剿匪

当时整个通县地区掀起了群众性的剿匪运动。剿匪斗争中，通县剿匪指挥部先后与大兴、武清、安次、香河等友邻县建立了治安联防委员会，互通情报，协同工作。通县七区与大兴县六区，四、五区与通县镇的东、西、南三关也建立了治安联防委员会。截止到1950年10月，共建立县级治安联防委员会3个，区级8个，村级19个。同时整顿和健全了各级治保组织，增强了治保队伍的战斗力和战斗力。所以，尽管土匪活动狡猾、猖獗，但都没有逃脱人民群众联防剿匪的天罗地网。如在侦破特大土匪案件李树芬团伙的初期阶段，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刑警大队和有关分局很快抓到了匪首张德广、李树怀等；武清县公安局抓获了李树芬、李顺良等；安次县公安局抓获到匪徒卢秀夫，直到将一土匪团伙29人全部抓获，都充分显示了治安联防联剿的巨大威力。

在通县剿匪斗争中，全体通县武装干部和广大民兵，特别是通县驻军，都是极其重要力量，他们始终与公安干警、治保积极分子并肩作战。据县公安局1950年7月5日不完全

统计,全县共有县级联防指挥部3个,武装民兵32名,民兵22名;区级指挥部1个,武装民兵130名。并且在各级治安联防组织中也都有许多民兵积极参加。全县广大民兵做到了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坚持白天生产,夜里放哨,有力打击和防范土匪活动。

剿匪工作队和各派出所在开展调查摸底和登记工作中,有针对性地宣传“首恶者依法严惩,协从者从宽,老实改造,不予追究,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在政策感召下,一大批曾参与土匪犯罪活动或与土匪犯罪有牵连的人,纷纷坦白自首,协助政府进行剿匪斗争。

1949年12月24日,通县公安局一举破获了廉子福、王永太等9人股匪案件,就是利用一名被我们用政策争取过来的惯偷,打入股匪内部,及时掌握到该股匪4次去大兴县、京南郊十四区等地抢劫后,准备在当天晚上分脏的情况,将该股匪一网打尽的。

通县公安局破获的1950年5月12日发生在马驹桥德茂楼布店的抢劫案,开始只捕到张明安、张永盛等4名匪徒,其余5名匪徒漏网。以后,经过剿匪工作队与亲属做工作,被我政府争取过来的大土匪头子张进贤做匪首董宗荣的工作,促使负案潜逃的匪首董宗荣,匪徒李万春、杨致廷、郭四等5人,先后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得到宽大处理,争取教育了多数,孤立、打击了极少数。

研究规律 穷追不舍

通县剿匪斗争初期,由于经验不足,打击不力,剿匪指挥部和各工作队通过学习党的政策,提高了认识,特别是注意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分析土匪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大家一致认为土匪活动虽然猖狂,但他们在强大的新民主主义政权面前,毕竟是作贼心虚,垂死挣扎,千方百计地伪装。所以土匪活动的基本规律和特点是游击方式,常常是夜聚昼散,东抢西藏,行踪不定,时分时合,善于伪装。他们有的以商贩为掩护,隐居城镇,秘密

策划土匪活动。匪首李树芬、李树栋、李顺良、张德广,老家在通县四区农村,北京城里都有住所。1949年12月,他们在北京西单商场附近的皮裤胡同16号李顺良家里密谋策划行动计划,商定分4个行动组,以组为单位进行抢劫,作案地点和手段,据情况而定。因而全体剿匪工作人员下定决心,要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全部、彻底、干净地将土匪剿灭。紧紧抓住了“发现线索,一追到底,全部抓获”这三个根本环节,狠狠打击了土匪的现行犯罪活动。

1950年4月17日至25日,以通县公安局干警为主的剿匪力量和武清县公安局部分干警,在北京市公安局和安次县公安局的大力支持下,破获了李树芬为首的特大团匪案件。

侦破开始时,通县公安局掌握到三个方面的土匪活动线索。一是1950年1月27日,武清县公安局抓到的土匪胥良,供出同案犯通县四区半截河村的刘玉普;二是3月6日,通县四区应寺村农民施德芝丢牲口,该村地主李树生、刘景瑞、陈殿祥有据可疑;三是同年4月6日,北京市南郊公安分局来函介绍土匪赵文焕供出应寺的刘景瑞、李树怀、李树栋有土匪活动。对此,通县公安局及时研究,制定侦察方案,并决定要求四区区委负责做好重点村重点人的监视工作,该区公安助理刘守义及时深入到这些村,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及时报告情况。这样,为集中力量破案做好了充分准备。

同年4月17日,通县公安局副局长刘志武带领4名侦察人员和县公安队一个班下到四区,与区委又详细研究抓捕李树芬团匪的行动计划,组成由公安、武装部和武清县武装部长张近中参加的16人剿匪小分队,由刘志武和区委书记李玉祥具体负责领导,及时掌握到重点嫌疑人刘玉普、刘景瑞等要在17日晚回家的情况。18日凌晨,小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一个战斗小组去半截河村抓捕到惯匪刘玉普。同时,由刘、李二位领导带

领的分队主力进发应寺村，天还未亮就把村包围，以泰山压顶之势，猛虎扑食似地将匪徒刘景瑞、李树生、张德祥、刘景勤抓获。经过当场突审刘景瑞、刘玉普，掌握到残匪逃匿的具体方向和地点。小分队又不失战机地分3个战斗小组向四区的崔各庄、满庄和大兴县南辛店方向追击。李玉祥小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克服了很多困难，由崔各庄跟踪追击到南辛店，抓捕到要匪辛洪廷。当天，通县公安局共抓获到该团匪中的7人。19日，通县公安局连续作战，召开剿匪参战人员和部分干警参加的会议，研究、部署继续猛追残匪工作。会后，通县公安局派调查股长于忠林等4人去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和有关分局，请求协助抓捕匪首李树怀、张德广和要匪李宝琦等4人；还派调查股的赵和地同志去安次县公安局请求协助抓捕匪徒卢秀夫。

同年4月18日，武清县武装部长张近中，回本县向剿匪指挥部汇报通县两天追捕李树芬团匪情况和残匪可能隐蔽地点。该县立即组织起29人的追剿分队，在9个残匪可能隐蔽的地点，布置公安队战士和民兵蹲坑、埋伏、盘查、堵截和追击。经过不到5天的战斗，终于将匪首李树芬、李顺良、李洪如和要匪党德臣、刘宝山、何培林等6人抓获归案。

至此，该团匪案29人，只有6名土匪负案在逃。此案共缴获各种枪14枝、手榴弹2枚、子弹若干，并有大车、牲口等大量物品。

1950年1月中旬，驻安平镇的侦察巡逻队了解到该镇的李朝弼、李茂生等一伙，在旧社会当过国民党的自卫团、壮丁队，恶习不改，游手好闲，没有正当收入，而经常在一起吃喝，花钱随便，非常可疑。这时剿匪工作队在宣传党的政策时，教育争取了一名在旧社会当过土匪的群众，掌握到李朝弼一伙人有枪支的可靠线索。通县公安局得到此报告后，立即组成了以侦缉股长刘东升为首的专案组，展开了侦察工作，首先利用1月27日

晚上安平镇召开群众大会散会的机会将匪首李朝弼、李茂生抓获。当天夜里对二匪首进行了突审，第二天派3个战斗小组到香河县王家摆村、指务村抓获同案犯秦志超等3名匪徒。该股匪9人很快被全部抓获，并缴获三号德制手枪1枝、子弹11发、黄金8两3钱，人民币4212万元(旧币)。至此，完全侦破了中央密云矿业合作社被抢劫的案件。

土匪肃清 人民安宁

通县在1949年初至1950年底的剿匪斗争中，共侦破土匪案件43起，其中股匪案21起，散匪案22起。逮捕犯罪分子106名，其中匪首17名。这些匪首多数被判有期或无期徒刑，少数判死刑。如李树芬、李树怀、李洪如、李顺良、辛洪廷，于1950年10月26日，被依法判决死刑，分别在通州镇、永乐店公判处死。当时未归案的李树栋等6名土匪，也陆续落网。1955年11月16日，李树栋被依法处死。对多数的一般参与土匪活动的人，只要能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人民政府实行宽大处理的政策，一律释放回当地生产劳动。

在清剿土匪犯罪活动的战斗中，共缴获各种枪49枝、子弹323发、手榴弹13枚、电台1部、胶轮大车6辆、自行车28辆、大牲口2头、黄金8两3钱及大量粮食、布匹、钱等财物。

近两年的剿匪斗争，狠狠打击了土匪的犯罪活动，显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强大威力和新中国的优越性。通县境内的土匪，基本上得到肃清。社会治安秩序好转，人民群众开始安居乐业，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工农业的发展，为全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王田波 北京市通州区公安分局一级警督，已退休。



攻克马驹桥

孟宪良

晨5时，中国人民解放军41军3纵第1354团奉命收复马驹桥镇。解放军攻击部队冲破重重阻碍，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相继爆破敌炮楼、地堡6座。残敌逃至镇东(今马驹桥中学东墙外)一坚固工事内，企图负隅顽抗。攻击部队迅即将敌工事包围，鸣枪示其投降。狡猾的敌人佯装投降，打出白旗。就在攻击部队收拢包围圈时，诈降的敌人突然开枪射击，使攻击部队70余人牺牲，近百人受伤。攻击部队当即对顽敌据守工事施行炮轰，其余官兵迅猛出击，一举歼敌200余人，并将敌连长生擒。马驹桥镇随即被攻克。是日下午2时，冀东14军分区13团挺进通州城，通州全境即告解放。

为纪念马驹桥镇解放50周年，1998年12月中共马驹桥镇党委、镇政府在战斗遗址立“革命烈士纪念碑”，以祭先烈，昭示后人。

孟宪良 通州区文化文物局干部。

晨声摄

通州解放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对据守在马驹桥镇的国民党军残部、顽敌进行了一次攻击战。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告捷后，东北野战军即挥师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会合，迅即完成对平津敌人的战略包围。是年12月13日晚，国民党傅作义部为保存实力，将龟缩于通州城内的13军第5师等主力部队撤回北平。通州解放在即。然而，据守在马驹桥镇的一个连国民党军顽敌及部分壮丁队员，妄图凭借多年构筑的炮楼、地堡等防御工事，阻止解放军攻克马驹桥镇。1948年12月14日凌晨

马驹桥镇革命烈士纪念碑

通县 1948 年 12 月 14 日解放不久,随着我军攻打天津、和平解放北平(北京)战略的需要,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所属教导五师奉命从河北三河县调到通县潞河中学墙外铁路南(今小营房、梨园、九棵树、杨家洼、小街一带)组建接收、训练国民党俘虏集训营,简称训俘营。

当时的教导五师下辖 6 个团,每团约 100 多人。师长叫张苏,政治部主任谭后来,我负责参谋部工作。师指挥部设在通县梨园小街。

由于当时的条件艰苦,加之部队流动不定,所以,作为完成临时性任务的训俘营并没有自己固定的营地和住所,本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原则,我们的训俘人员绝大多数分散居住在老百姓家里,吃的是小米,一个星期顶多吃上一顿大米或白面。如果改善一次伙食,战友们喜之不尽。

就是这样一班人马,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于我军解放天津的当天就接收天津宪兵三团少尉(排长)以上俘虏近 200 人,经过严格的教育训练后,此批俘虏中的连、排级军官被充实到我军部队,有些人在大军南下时还成了骨干。

我军和平解放北平后,原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师以下军官都在通县训俘营受训。其中 600 多名青年军成员受训结束后还被送往华北军政大学进一步深造。当时,北平实行了军管,社会上清理出的“渣子”和“涉嫌人员”也都遣放在训俘营教育管理。俘虏中除大部分士兵或中下级军官要求解甲归田,我军给出具证明、开路条、发路费、允许遣送还乡者外,占被俘人员总数约五分之一的伤兵完全由我军负责调养、教育。师以下

通 州 解 放 后 的 训 俘 营

曾乃

军官由我军按军阶分期分批集中进行教育培训,每期训练时间约 3 个月。

训练的主要内容有:

(一)政治学习。主要学习唯物辩证法和毛泽东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十大原则。

(二)军训。主要是队列训练、出操。

(三)思想教育。主要搞“诉苦水”、“挖苦根”活动,结合个人家庭境况和家乡人民生活现状,控诉国民党腐败统治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我军严明的纪律、与人民情同手足的情义、官兵平等一致的关系、言出必行的优俘虏政策以及解放区人民拥戴我党、我军的具

体行动,使受训俘虏感受颇深。经过教育改造,俘虏中存有的敌对情绪逐步消除了,隐藏潜伏的国民党特工也被一个一个地挖了出来,一些国民党部队团以上军官在负伤、调养期间,对我军实行的人道主义政策很感激,态度转变较快。

通县的人民,虽然担负的军队给养任务很重,但每次送到部队的物资总是超额,他们把最好的粮食奉献给了解放军。

出于感化和改造的需要,训俘营中的俘虏在某些方面享受的待遇确实超过了我训俘人员。在伙食供应上,尽管我们吃的是小米,但供应俘虏的(不管是否伤兵)都是大米和白面。每到星期天,俘虏的家眷等还可到训俘营来探视、团聚,我军保证来去自由。

随着训练时间的推移,俘虏心中的疑团逐渐消失,绝大多数俘虏认清了大势所趋,他们在找到了自己(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脱离民众、失人心之后,对解放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慨叹之余不禁由衷地折服,同时也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很多的俘虏投身到革命的行列里,矢志重新做人。剩下的一少部分国民党部队营、团、旅、师级人员,在大军南下时移交给了华北军区联络部。

教导五师在通县驻扎的半年多时间里,圆满地完成了训俘任务。

大军南下时,教导五师所辖 6 个团交杨思路、陈方忠同志编入了空军。(吕威生整理)

曾乃 原冀东军区第 14 军分区 16 团政委,离休时任中央第二政法干校校长。

在接收通州的日子

岳锡忠

1948年，我在平谷县公安局工作。11月，辽沈战役告捷，局领导讲今后要解放很多城市，需要大批人员去做接管工作，现在调你们几个人到十四地委去学习，地址在平谷县西高村，任务就是学习城市政策，准备接收通州，管理城市。十四地委公安处处长李猛给我们讲课，主要内容是朱总司令命令，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组织纪律等。同志们学习劲头很足，对入城守则，约法八章都背诵得很熟。在学习期间，组建起了通州市各级领导班子和组织机构。

学习近半个多月，由于解放通州日期迫近，于是我们这部分接收人员，迁址到接近通州的顺义县靠潮白河河东的孤山继续学习。三四天后，我解放军骑兵师，正路过我们学习驻地，同志们都出来看。威武雄壮的骑兵，大有排山倒海、不可阻挡之势，由北向南进发。我从未看过这么多的骑兵马队，足足过有半天时间。同志们精神振奋，高兴极了。我们回到驻地，将入城问题进行了紧张而热烈的讨论。

当天晚上紧急集合，说通州的敌人已经逃跑，要我们马上入城。我们立即跑步向通州进发。月黑天的寒冬深夜，鸦雀无声，只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很快到了通州北关铁路大桥，铁桥上铺搭着木板，我们顺利地过了桥，那时北浮桥已被敌人烧毁，还能看到尚未完全熄灭的小火亮。走到通州北门外，看到我们的军队已经在城门旁站岗，城墙上也有岗。夜里11点左右，我们走到司空分署街东口，停了下来，然后分别去贴事先印好的城市政策小报。我和几位同志一起顺着大街一直贴到旧城南门，那时南门洞口已被敌人用大砖坯堵死，尚未拆开。我们去司空分署街小学校，睡在拼凑起来的小课桌上，次日清早去万寿宫同利饭馆吃过饭后，分别去做接收工作。我们通州市公安局的同志都到敌警察局接收。

通州解放了，成立了由河北省十四专署领导的通州市。江卓任市委书记兼市长，张树田任市委纪检书记，公安局长是刘子山。公安局下设五个公安分驻所（派出所）。我在张中正同志任所长的北城鼓楼二

区公安分驻所。二区政府设在北城大关庙内。

1948年12月20日，二区首次在西海子礼堂（如今的西海子电影院），召开全区群众大会，参加会的群众特别踊跃，都想看看共产党、八路军开会什么样。当年我20岁，只知工作，就先到会场去了，到台上一看参加会的人挤满了礼堂，挤不到里边的就站在外边。由于区领导还没来，我先讲几句。讲到现在北平已被我人民解放军围困住了，很快就要解放。讲了城市政策，又讲到收缴敌人逃跑时遗留下的枪支子弹等军用物资都要送鼓楼公安分驻所。区领导到会后，正式开会，讲述了我们党的方针政策、社

会治安、群众生活等等。会后，群众很满意。

在收缴敌人遗留物资时，当天就有群众把物资送交鼓楼公安分驻所的。送的东西有破旧枪支、刺刀、子弹、军衣、军毯、被褥、鞋袜等等。送来的物资没什么手续，不记数，都堆在鼓楼中大殿内，无人看管。

当时我所同志穿的都是粗布衣、纳帮鞋、粗布袜，盖的是旧薄被。如果从这些物资里随便拿一些穿的、盖的都比自己的要好得多，但没有一个人去动用。因为一是我们党有铁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动群众一针一线，包括收缴物资；二是同志们高度的革命自觉性，艰苦奋斗、两袖清风的传统。这也是我们党联系群众、取信于民的原因所在。

我们区所管辖的范围，从万寿宫（如今的新华大街）以北到北门里，由东门到西海子城墙根。

那时通州的主要商业买卖在二区。由东门到鱼市口大街两侧都是商业门面，欲升和、义和号、三义点、东兴居等几家大商号都在这条街上。南北大街两侧也是商业门面。在解放几天之内，都已开门营业，群众往来热闹非常，社会治安良好。从此通州市的各项工作纳入正轨。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通州这座古老的城市业已牢固地掌握在人民手中。

岳锡忠 原通县经委组织科科长，已离休。

参加接管简易师范学校的经过

曹乃木

1949年2月我在冀东军区长城部工作期间，与李一农同志一起被分配去接管通县简易师范学校。当时的领导同志交代了任务：除原学校校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王振东外，所有教职员工均留用，并筹备开学。由我任校长，李一农同志任生活指导。通州副市长侯方若同志说：“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工农干部，相信你们能很好配合，做好工作。”当时我才23岁，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一点儿学校工作经验也没有，心中没底，但组织上已经作了决定，只好硬着头皮去干。我曾想，也可能由于我曾在师范学校上过学，所以选中了我。不管怎样，这一决定也同时决定了我从事文教工作的一生。

通县简易师范学校坐落在鼓楼北靳家胡同内，是负责培养通县小学师资的学校。招高小毕业生，学习3年，然后分配到通县小学中工作。当时学校里由于有张宝贵、张凤鸣两位职员和张盛德、李华臣、田瑞田、宋宝忠等几位工人保护着学校，因此图书、仪器、文件以及全部学校财产，未受任何损失。学校其余大部分师生均因躲避战火而逃散了。我们通过留校职工找到了原学校教师张介眉、杨文绥、王晋生等，向他们说明了党的政策，打消了他们的疑虑，又通过他们逐步通知其他教师返校，然后积极筹备开学工作。因当时通县城关地区改设为通州市，所以校名也改为通州市初级师范学校。

为了充实教师队伍，提高教学质量，我们

先后请冀东军区长城部的张我懿、丁广洲来校讲课，后又请北京大学毕业生常燕玉、申静、魏执礼等参加学校工作。在课外活动方面，我们组织了腰鼓队，开展了话剧、歌剧、舞蹈以及其他一些文艺活动。全体教师（包括附小教师）还演出了“火”、“思想问题”等剧。在大军过江解放南京、上海时，师生一起多次上街、下乡，积极参加了社会宣传工作。这对贯彻党的政策、发动群众都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也丰富了课余时间，提高了学生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通过课内、课外的努力，我们在不算长的时间里，把进行反动教育，贯彻“不苟言笑”的一个死气沉沉学校，变成了“团结、进取”而又朝气蓬勃的新型教学场所。

我们接管这一学校后，原冀中行署教育科长郭敬辉同志（曾任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副所长）到通州来，看到了这个学校较快的重建和发展，并且即将有几十名学生毕业，商同通州市领导，计划分配一部分毕业生到师资极为缺乏的冀中地区工作。我们在学生毕业时作了动员，同学们都纷纷表示愿意服从分配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最后我们选择了年龄较大的二十几位同学，去了冀中的固安、文安、霸县等地。

半年的工作里，我们较好地完成了任务。1949年7月我们第一次招新生一百名，结果有一千几百名学生报考。这也说明了我们的工作已经得到了群众的肯定。

曹乃木 商务印书馆副编审。

李国纯

我于1949年9月中旬，来潞河医院负责总务工作。当时虽说是通州解放了，但潞河医院还属于基督教美国公理会管辖。1951年4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卫生厅接管了潞河医院。我亲身经历了潞河医院在政府接管前和接管后的情况。在庆祝通州解放50周年之际，就我所记忆的写出来，不失历史资料，但时移事迁，不免有误，请有识者批评指正。

当时潞河医院的规模

潞河医院总占地面积24亩，医院建有两层小楼一幢，建筑面积600多平方米。小楼底层为门诊部分，上层为男病房、手术室；楼两侧建有两排平房，共40多间，分别为女病房、妇产

科病房及职工宿舍、伙房、洗衣房等。医院设病床位50多张，门诊不分科。而以男、女、产分设病房。全院有医务工作人员20多人，医院能做透视、常规检验、外科腹部、妇产科简单眼科手术等。虽说医院规模不大，设备简单，这在解放初期京东一带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当时通州方圆百里的病人常来通县潞河医院就医，每天医院的门诊量近百人。

人员组成及待遇

潞河医院当时设院长1人，是由基督教北京公理会委派的。我来院时是王学仁先生任院长，他是公理会的神职人员（牧师），

山西太谷县人，曾留美就读神学院。设医师1人，先是复旦大学毕业的苏翼孙，后来是1950年冬来的殷慧愍（山西川至医学院毕业）。美籍女医师1人（萨爱伦）。正式护士5人，（其中美籍护士1人路仪斐）。药剂师1人，检验员1人，总务人员2人，挂号员1人，洗衣员1人，消毒清洁员1人，传达室1人，炊事员2人。当时医院工作人员工资是按实物玉米计算核发。院长及医师每月为6石玉米，

始建于1903年的潞河医院十字型楼

殊平摄

药、检、护、总务等人员每月为1石8斗玉米，每月发一次，发前先从粮店问清当日玉米行情，再折成现钱发给职工。政府接管后，经费改为每月由河北省卫生厅拨给，人员待遇依旧不变。

经费来源及与公理会的关系

医院为基督教美国公理会所办，公理会

1998年改造后的潞河医院

晨声摄

为了传教，在北京地区办了一些教育医疗单位。在通县地区有潞河中学、富育女中、潞河医院。这些单位的经费都由公理会供给。潞河医院有业务收入，故经费属于差额补助，每月拨款700元左右，全年不超过万元。我来医院后每月都到北京东城灯市口公理会领取经费，由该处开出支票到银行取出现金，同时顺便将所需药品购回。当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也给少量药和钱，都是通过公理会拨给医院的。此外美籍医师萨爱伦在国内募来的捐款，由她自己支配，遇到有病人贫困无力交纳医药费时，经她在处方上签字，病人即免交，收费人员另行记帐，最后由她支付。

医院既属私立，税务机关按工商业对待，每年交纳工商税约100元至200元。政府接管后即不再交。

成立工会组织与政府接管

1950年上半年，县已有了工会组织，相继成立了店员工、搬运工会等。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教工会，潞河医院即归入教育工会。故此医于10月建立了工会组织。抗美援朝

朝开始，人民政府对教会医院所定的政策是交政府接管收为公办；脱离教会与政府合办；职工自办。因当时医院已有了工会组织，除院长王学仁外都是会员，经过会员的集体讨论，一致赞成拥护由政府接管。随即向河北省卫生厅呈报，去人联系。医院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医院中的美籍大夫萨爱伦、护士路仪斐了解到政府要接管医院后，即于1951年3月回基督教北京公理会，后回国。1951年4月初。河北省卫生厅派来了高处长、殷科长2人，完成了接管工作。从此医院归人民政府领导，并更名为潞河人民医院。接管后政府仍任命王学仁为医院院长，并经全体职工选出了医务主任、总务主任、护士长等骨干部门负责人。政府为了加强医院的力量，从河北省通县卫生实验院调来医务人员，有医师、药剂师、化验员、工人等共七八人。卫生实验院的领导代表上级为驻院代表。

1953年政府拨款扩建医院，增加病床设备，完善科室，改善工作人员的住宿条件，至1954年5月床位已增至105张。

李国纯 原潞河医院财务科科长，已退休。



1948年12月14日，通州解放。店员工人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资方代理人则张惶四顾，观望彷徨，有的竟在店内宣称“少出门，多挣钱”，“锅里有粥大家饱”，明显地加紧了

店员工人的束缚。我工会组织则针锋相对地领导发动了反压迫、反剥削、争自由的斗争。

说理会首战告捷 “大胡子”低头认错

解放后，通州成立了店员工会，会员达780余名，并在各业中分别建立了工会小组。在通州工会组织具体指导下，明确了“与资方共同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繁荣经济，公私兼顾”的政策。对投机商的囤积居奇、操纵市场、扰乱社会的恶劣行径更提高了警惕。对打骂欺压店员工人的少数资方代理人，则予以坚决地打击。说理会上斗争“大胡子”，就是其中的一幕。

这个外号“大胡子”的资方代理人，叫鲁林，系河北易县人，在通州开了个清华浴池。此人游手好闲，生活糜烂，对12名职工，极尽盘剥之能事，无限度地延长工时，昼夜加班。工人有病不给看，还不准歇工，引起了职工的愤恨，决心对他展开说理斗争。

在隆冬腊月的一天，清华浴池堂屋内，炉火旺盛，灯火通明，30多名会员骨干，面对中间站立的“大胡子”进行着说理斗争。主持

人先让他交待对职工的态度。他两眼一眯，一言不发，摇头晃脑，满不在乎。这更加激怒了在场职工，当即进行揭发检举，如“加班加点，不顾工人死活”，“职工有病不给治，还逼着干重活”。与会者激愤地高呼：“不准虐待工人！”“职工要当家作主！”“不准资本家横行霸道！”紧接着职工王坤诉苦：“我因生病身体



清华浴池职工与“大胡子”说理斗争

张国图插图

虚弱，资方还硬逼着我摇辘辘提水，连轴转，被辘辘把打倒在地，险些掉在井里淹死！”这控诉，激起在场职工的义愤，纷纷指责“大胡子”，让他老实交待。这个阵势，迫使他软了下来，连连作揖鞠躬，承认了过去拿职工当牛马，对不起职工的事实。表示“一定给职工看病”，“一定提高工钱”，“保证接受职工监督”等，一扫往日的威风。在场职工扬眉吐气，争自由和当家作主的激情更为高涨。

抓住不法资方典型 展开深入批判斗争

自斗倒了“大胡子”，一些资方代理人表面上老实，但暗地变换了手法。有的抽逃资金，转移货品；有的不检修机器，还解雇工人，企图搞垮企业，断绝职工生活来源。针对这种不法商人的不法行为，我工会组织发动工人，对重点对象展开了有理有据针锋相对的斗争。首先各行业职工组织起来，声讨资方代理人，向资方争学习权、就医权、管理权，并对转移商品、限制工人学习、破坏工人之间团结的资方代理人，进行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使斗争引向深入，迫使资方低头认错，一再检讨和工人对立的思想言行，并表示将转移的商品运回本店，和工人一起搞好企业。

广利粮食加工厂经理，不顾职工生命安全，机器该检修不检修，硬让工人操作，造成升降机绞索断裂，以致掉下木头，砸在工人的脊背上。职工愤怒地控诉他这种只顾赚钱不顾工人死活的罪责，并振臂高呼打倒反动资本家的口号，迫使这个经理向工人赔礼道歉，并作出“立即检修机器，确保工人生产安全”的保证。中西药业资方无理解雇徒工，经过职工的揭发斗争，资方被迫保证立即接回被解雇的徒工，给予合理安置。

这些批判斗争会痛击了不法商人的嚣张气焰，削弱了资方和工人对立的思想，使其接受了店员工人的监督。同时，也锻炼了工人，扩大了骨干队伍，主人翁责任感大大增强。

控诉血泪史 烧毁卖身契

随着斗争的不断胜利，职工们感到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必须搬掉，那就是资方与徒工签订的所谓自愿的卖身“契约”。如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投河、跳井、走失，与企业无关；学徒期3年零一节，只给饭吃，不给工钱的苛刻条款，象紧箍咒，牢牢地掌握在资方手里，极大地侵犯和剥夺着工人的人身自由。出身贫寒之家的孩子，为了学点技术糊口，当个徒工，混碗饭吃，不得不背井离乡，忍辱负重地投靠到资方代理人的门下。从此吃尽苦头，受尽折磨，日复一日为资本家当牛做马。资本家稍有不顺，张口就骂，举手就打。

宋记铁工厂资方宋禄，就经常以契约吓唬徒工：“谁敢不听使唤，留神你的脑袋，我手里有你的契约，叫你死，你就活不了。”一次嫌徒工杜四拉风箱劲头小，火力硬度不够，竟在火炉里抽出烧红的铁条，硬往杜四身上打，杜四衣服被烧透，腿被烫伤，留下很大一块伤疤。

还有一个徒工张栋，卖身在一个姓柴的理发店里，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3年时间，几乎整天抱孩子做饭，侍候资方全家老小。一次因为没给顾客剃好头，姓柴的顺手抄起火通条，打在张栋胳膊上，一溜血印，一溜伤疤。

各业资方欺压打骂徒工的事，时有发生。仅在五金、铸铁、钟表、照像、成衣、制鞋、理发等行业徒工投诉到工会的卖身“契约”就有200余件。打碎枷锁、烧毁契约，成为通州广大店员工人的迫切要求。

店员工人的要求，合情合理，得到了人民政府的支持，并于1950年1月1日，得到了批准，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这一天召开了大会，由中心城镇职工会亲自组织主持，七百余家上千名的店员工人以及资方代理人有秩序地进入会场。庄严会场的四周墙上贴满

疏浚凉水河亲历记

闫振峰

解放初期，我曾在通县工作，亲身经历了当年疏浚凉水河的工程，许多往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据有关资料记载：凉水河发源于右安门外西南之凤泉，流经万泉寺、大红门、旧宫，于马驹桥入通县境，再经高古庄、张家湾入北运河。凉水河自金朝修挖，历经元、明、清和民国时期。由于年久失修，到解放前夕，这条河已经不成样子了。河槽蜿蜒曲折，河坡多处塌陷，河床大部分淤塞，以致行洪排水不畅，多次发生洪涝灾害。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为了减少洪涝灾害和顺利排放北京城内的积水，及时做出了疏浚凉水河的决

定，并按地区划分了任务（当时通县属于河北省通县专区）。我当时是通县专区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任修凉水河总指挥。沿河两岸各村的干部、群众听说要修凉水河，没等动员就争先恐后报名参加修河。不过，修河毕竟不是小工程，只靠沿河两岸群众难以在预期内完成任务。考虑到不影响农活，通县人民政府除从全县动员民工以外，通县专区还从香河、三河、昌平、顺义等县组织民工支援。就这样，一支有3万名民工的修河大军很快组织起来了，他们肩担土筐、扛着铁镐、手推小车，来到沿河工地安营扎寨。记得那是在1955年3月，疏浚凉水河工程正式破土动工了。

了标语口号。当主持人宣布开会、致词后，广大店员工人争先恐后，要求上台控诉揭发，将资本家敲骨吸髓的压榨剥削行径、丑恶面目，无遗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受害者张栋高举他的卖身契和被烫被打的伤疤时，会场沸腾了，口号声连连不断：“还我工人自由！”“铲除封建残余，废除卖身契约！”“打倒反动的资本家！”呐喊声、讨伐声，一浪高过一浪，极大地鼓舞了职工的斗志，震慑了反动资本家。他们一个个像霜打的茄子、泄了气的皮球，蔫头耷脑，无地自容。会后，大会郑重宣布：“从即日起，全市各业，凡属旧社会劳资双方订的契约，一律无效，立即全部销毁。”职工听后掌声雷动，振臂高呼：“工人队级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封建传统束缚店员工人的枷锁被打碎

了。这个喜讯像一股春风，吹遍了通州的千家万户，并将1月1日颂为“废除契约日”。从此，通州一千多名店员工人，彻底解放了，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加工会的各项活动，上夜校、学文化、学政治、开展文体活动，成为党在私营工商业中一支坚强力量。很多年轻人加入了共青团，参加了共产党，有的被提拔到各级工会的领导岗位。店员工人任大恒，还被选为人民政府常务委员，参与了国家大事的研究和讨论。

任大湖 解放前在三益真杂货铺学徒，解放初是通州区职工会中心组领导成员，后任通县人民政府能源办公室主任，现退休。

张振宗 原通县农业局党委书记，现退休。

阳春三月，乍暖还寒。当时人们一早还披着夹袄，可是修河的民工早已光着膀子干得汗流浹背了。民工们天亮就出工，日落才收工。一日三餐吃的是窝窝头、青菜汤，很少吃大米、白面。尽管生活艰难，但大家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为修河付出了极大艰辛，洒下了无数汗水。凉水河水位浅，挖不到2尺就出水了，民工们就赤脚在水中作业。身上流着汗，脚下踩着泥，有的人弄得浑身泥水，可照样你追我赶，比着劲干。民工当中多数是村里的民兵，年轻力壮，但沿河两岸也有一些上年纪的人参加了修河。他们老当益壮，干劲儿丝毫不比青年人差。有人不解地问他们：“你们修河图什么？”通县高营村一位50多岁的农民响亮地回答：“图的是拔掉穷根，造福子孙！”

疏浚凉水河不仅需要裁弯取直，有的地方要挖土方，有的地方要填土方，同时还要筑堤。当时没有拖拉机、掘土机，也没有大车和大牲畜。挖土、运土全靠一副肩膀两只手，使用的工具就是小推车、土筐加上锹和镐。一辆小推车能推三四百斤，一副土筐最多只能挑二百斤。为了加快进度，有的民工一肩挑上4只筐，成了工地上的“铁肩膀”。有的自己动手把小推车车头加宽，一次就推上千斤泥土。更困难的是从河底往上运土，道路坑坑洼洼，车轮压上去，一陷三四寸深，三四十度的陡坡又不能直着往上推，要走斜坡和8字形的路，从较深的河底推上来。香河县有位民工不仅加宽加长了车头，还在车把上拴个绳套，套在肩膀上，推车时两手和肩膀齐用力，时间不久，双手和肩膀都起了老茧。我和指挥部的同志在工地和他握手的时候，都深深感到那双手的无比力量。

在修河当中，最困难的工程要算修三箱

涵洞和榆林庄大桥了。修涵洞、架桥桩得先开槽，可是深挖下去是流沙，上午刚挖好，下午又被沙子填满了。所以只得边开槽边打圆木桩或板桩，然后填筑水泥。这种活不光要用力气，还得有技巧，稍不注意，就有被流沙埋没的危险。参加施工的民工在困难面前不低头，有的人碰破了手脚简单包扎一下接着干，有的人跳到基槽里排积水，宁肯自己多吃苦受累也不让别人替换。每当工程进入关键时刻，附近工段的民工都主动前来支援，因此，别看修涵洞、架大桥困难比较多，但由于大家团结奋战，互相支援。还是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任务。

参加修河的民工都由当地县、乡、村干部带队。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坚持跟班劳动，同民工一起并肩战斗，休息的时候，他们还得关心民工的吃住，解决他们生活当中的具体问题。真是身教胜于言教，在干部的积极带领下，民工们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一鼓作气，大干3个月，按时完成了主河道土方工程，当年年底全部完成了疏浚凉水河（包括筑堤和建筑物工程）的任务。

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内排污量不断增多。1959年以来，党和政府对包括凉水河在内的几条排水河道曾多次组织民工进行治理，重新加宽了河道，为了河两岸群众的交通方便，增建了桥梁，并在榆林庄建成了便于拦污导污的榆林庄闸。通过整治，城内的雨水、污水都乖乖地顺着凉水河和其它排水河道安全下泄，为首都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减轻了洪涝灾害对凉水河两岸人民群众的威胁。

闫振峰 原北京市气象
局局长、党组书记，现离休。



取缔反动道会门概略

鲁新鹏 李明玺

解放前，各种道会门遍及通县城乡。据通县公安局 1949 年底和通镇分局 1950 年上半年的统计，全县共有各种道会门 27 种，5825 人，其中道首 190 人，道徒 5635 人，主要是一贯道。

道会门是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一种封建迷信组织，多数被反动统治阶级收买和把持，成为麻醉、奴役劳动人民，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通县解放后，反动道会门与日伪残余组织和敌特分子相互勾结，向群众灌输封建迷信思想，离间群众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系；搜集我方情报，刺探我军动态；有的打入我内部，操纵基层政权，破坏我各项中心工作，企图复辟封建统治。七区骚子营的全佛大道会于 1950 年 11 月 19 日还组织了反革命暴乱。

鉴于反动道会门的猖獗活动，中共通县县委于 1950 年 11 月 30 日发出了《关于取缔道会门的具体指示》，明确指示，取缔重点是一贯道、九宫道。方针是：宣布道会门组织为非法，依靠群众，组织群众，使群众了解道会门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发动群众孤立一般道首，公开争取一般道徒，揭发检举道首罪行，启发道徒退道，以达取缔之目的。1950 年 12 月 15 日，在县委书记王宪，县委常委公安局长杨清波带领下，18 人的工作队进驻七区骚子营、次渠、郑庄、崔家窑等反动道会门活

动最猖獗的村进行重点取缔，仅 3 天时间，就使这些村的退道人数达 551 人。接着对麦庄、北神树、丁、白、马、孟、壮丁屯等 13 个村的道会门进行了取缔。到 1951 年 2 月 1 日，使 917 人声明退道，对 41 名道首进行了登记、集训和管制，从而推动了全县的全面取缔工作。县政府于 1951 年 1 月 19 日发布了取缔道会门的布告，要求立即停止一切道会门活动，责令道首及有现行活动的道徒到公安局登记，号召道徒一律脱离组织，揭发道首罪行。

通过广泛、深入宣传政策，发动群众，揭发反动道会门罪行，集训道首和有现行活动的道徒，按照镇压极反动少数，争取教育从宽，分化瓦解其组织的方针、政策，到 1951 年 3 月，据通县公安局统计，共判死刑的 16 人，判有期徒刑的 9 人，交村管制的 17 人，集训道首 35 人，声明退道的 5362 人。基本上使各种道会门停止了活动，从而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稳定了社会治安秩序，巩固了人民政权。在此后的时间里，对继续活动的道会门均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予以打击和取缔。

鲁新鹏 北京市通州区公安分局一级警督，已退休。

李明玺 北京市通州区公安分局一级警督。

